

名人名家书系

费孝通 著



走出江村

走出江村

费孝通 著 张智楚 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7·6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江村/费孝通著;张智楚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名人名家书系)

ISBN 7-80002-910-7

I. 走…

Ⅱ. ①费…②张…

Ⅲ. ①费孝通-文集②社会学-文集

Ⅳ. 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 06307 号

书 名:走出江村

著 者:费孝通

编 者:张智楚

责任编辑:吴 晔

封面设计: 华

出 版 者: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编:100733)

发 行 者: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科技印刷厂

字 数:307千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5.75

印 数:6000

印 次:1997年6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002-910-7/D. 179

定 价:19.50元

自序

1992年张智楚同志为我编辑了一本《行行重行行》，今年她又受人民日报出版社之约为我编辑一本《走出江村》。这两集都是从我旧作中选出的文章编成的。前者依我的行程为依据，后者以我的思路为轨迹。

今年9月，我的亲友旧好为纪念我江村调查六十周年在家乡举行了一次欢叙。我把六十年来在家乡追踪调查的文章编成《爱我家乡》一书作为答谢。大概这本文选启发了张智楚同志。她认为我这个人的思路在过去六十年里并没有囿限在家乡这个小小农村里，实际上早就走出了家乡这个小农村，面向全国，甚至已面向世界。《爱我家乡》只表达了我的感情，并不足以反映我的思路。也许正由于这种想法，又编出了这本《走出江村》作为《爱我家乡》的姊妹篇。重情还是重思，各有所偏，情思并存才比较周全。

自从我初访江村以来的六十年里，我确是环绕地球行过几次，特别是文革结束后的近二十年来，我已入暮年，可为我所用的岁月不多了，所以我从七十岁开始的“第二次学术生命”里，不能不加快步伐，一天当两天用。在过去的十六年里，我在祖国大地上，除了西藏和台湾外，不断地东西穿梭，南北奔走，切身感觉到身逢盛世之幸。

人的思想原本是时代的反映。我的学术生命也无不是从今生处世的所见所闻中形成。江村是我有意识地观察我国农村社会和文化的起点，也就孕育了我一生的学术思想。饮水思源，自有其感情上的依恋。走出江村之后与各地的接触正是我学术生命得以维持至今的营养来源。《走出江村》这本集子多少把我的发育过程理出了一个头绪。使我对自己的思想生长更能自觉一些，确是件好事。这是我应当向编者和出版社感谢的。

编者要我为《走出江村》写篇序言，其实写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最后我还想加几句多余的话，因为时代还在前进，我的生命还没有结束。回头看我过去的一生，觉得我头脑里的许多想法总是说不完也总是说不清楚。这几年来越来越感觉到不断反思的重要。反思固然本质上不同于文革时的“思想检讨”，但不断地对自己思想反复咀嚼却是大有回味的。不突破原有的思想框框，也不容易产生新的看法和注意接触新的事物。客观世界正在方兴未艾不断发展，自己的思想一旦凝固，那就必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落后了就会被淘汰，我年纪越老，这种警惕性也越来越敏锐。

我从农村走进了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从小城镇走进了正在遍地开花的中小城市，从中小城市走进了以正在勃兴的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我当前正在进一步注意这些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即东、中、西以及南、北不同经济区域怎样共同发展的问題，也就是说我们这许多发展不平衡的地区怎样能联结成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形成一个全国性统一的经济区域。这已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这时我不能不警觉自己生命的限度，禁不住要自问一句：这些问题能在我有

生之年得到解决吗？再想到当前这个已被经济联成一体的世界，在这样多民族，这样多国家，处处是疆界的世界里，人类的理智是否能制约得住传统形成的分裂和对抗，甚至导致破坏和同归于尽？我走出了江村，走出了小城镇，走出了大中城市，走出了经济区域，走出了全国一盘棋，还得继续向前走，走向何处？让我把这个问题给下一代人去回答吧。

费孝通

1996年12月25日

于北京北太平庄

目 录

自序	费孝通 (1)
志在富民——八十自语	(1)
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	
历程的再回顾	(3)
谈谈城乡协调发展	(28)
农村调查——《社会调查自白》之四	(47)
重访江村 (上编)	(61)
重访江村 (下编)	(79)
三访江村	(89)
《云南三村》之《禄村农田》导言	(107)
重访云南三村	(114)
小城镇，大问题	(131)
四年思路回顾	(177)
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	(218)
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和我的研究工作	(231)
长江三角洲之行	(249)

重访徐州	(265)
京、津、冀联手，把天津建成华北的 经济中心	(276)
黑龙江行	(282)
凉山行	(293)
南岭行	(308)
甘肃行	(317)
珠江模式的再认识	(335)
人的研究在中国	(347)
个人·群体·社会	(363)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	(389)
从马林诺斯基学习“文化论”的体会 (附：讲课插话)	(430)
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483)
后记	张智楚 (490)

志在富民

——八十自语

我的生命已经跨入 80 岁的界限。孔子说到 70 就停住了，因为他没有跨过 80 的界限。80 之后应当怎样，现代的人才资格说。我国人民平均寿命已达到 70 以上。进入 80 岁的人越来越多了。超过 80 岁，以多寿为祝的传统中应当说是件好事。事实上是不是件好事，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力是否能养得起体力衰弱的老年人。在中国使多寿成为好事还有待我们的努力。

人寿又似乎属于受主观意志所转移的范围。我早年确实没有料想到我这个从小就以羸弱为父母所愁的幼子会活得这样长，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年龄。既来之，则安之。这是我跨过这条年龄线的第一个念头。安之看来还是不够的。不仅自己要安，还得使人家也安，那就是不能成为社会包袱。我自己明白，过去的 80 年，受之于社会的远过于我对社会作出的贡献。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必然使社会萎缩、软弱。我跨过了被视为老年的界线，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呢？这是我第二个念头。

第三个念头是，我是不是有些事想做而没有做完的呢？

跨入老年，自己应该明白，等于是说来日不多了。如果手上还有些没有做完的事，那就得抓紧做了。有没有做完的事，就看自己有没有要做的事。这是属于“人各有志”的内容。我在跨线之际也试图自己答复自己，“尔志何在？”我的答复也是四个字：“志在富民”。这四个字也许可以贯串地表现在我从30年代起所写的文章之中。当然这些都是纸上谈兵。但还不能不说是有志于此。富民作为目标，从80年代开始已看到了端倪。划的贫困线以下的不到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了。我有希望在这一生中看到消灭的贫困线下的数字。

“志在富民”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富了怎么办”的问题。我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但是究竟已跨过了老年界线，留着这问题给后来者去多考虑考虑，做出较好的答案吧。

1989年11月2日

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

——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

我一生的学术工作是以农村调查开始的，其后进入小城镇研究，近年来又开始区域发展的探索，统称为一生社区研究的历程。流年似水，转眼已经六十年了。当我进入八十五岁的时刻，似乎值得自己回头反省一下。由于我已在1985年发表过“社会调查自白”，1989年发表过“四年思想回顾”，这次反省只能说是再回顾了。但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多少有一条前后联贯的理路，所以还得从头说起，其中有一点重复在所难免。

—

我这一生有个主题，就是“志在富民”。它是从我学术工作中产生的，我的学术工作也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

1935年偕我妻王同惠进入广西瑶山调查瑶族农村，合写《花蓝瑶社会组织》。1936年在我家乡的一个农村里进行调查，后来写成《江村经济》一书。我在农村实地调查里从亲眼所见的事实产生了一种想法：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内忧外患使他们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陷入不足温饱的极端贫困境地。当时的历史现实，促使我发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也为我后来一生“志在富民”的追求扎下了根子。

四十年代我曾在云南内地进行农村调查，与张之毅同志合写成《云南三村》。其后，我曾应《世纪评论》之约，连续写了十几篇讨论中国农村社会特点的文章。这些文章分期连载后，集为《乡土中国》一书。我还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农村复兴的文章，后来被观察周刊社汇编成了《乡土重建》单行本。我在这本书里提出了农民温饱的“小康水准”、“现代工业技术下乡”、“乡土工业”等问题和想法，都是围绕中国农民脱贫致富这个主题做的文章。

全国解放后，五十年代后期，我1957年重访江村。看到当时农业有了发展，粮食增产，我感到高兴。但是，也看到副业被忽视了，乡村工业没有得到恢复，农民虽有土地可耕种，却只能搞粮食，手里没有钱花。市镇上的商品交换日益萧条，小城镇也萎缩了，这使我忧心忡忡。我在《重访江村》一文中建议恢复发展副业和乡土工业，在村子里办小型工厂，希望促进农民尽快富起来。

意外的政治运动打断了我这种发展农村经济的愿望。“反右”斗争中，我被划成“右派”，失去了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的机会。从那时起直到文革结束，我这篇富民的文章做不下去了。

1966年到1976年的全国大动乱，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直到拨乱反正后的1980年，农民的人均谷类配额仅约有580斤。以这样只够糊口的粮食来维持农民全部生活费用，显然远远不够。何况各地产量并

不平衡，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所得远低于这个平均数，他们依然没有摆脱贫困状态。这样的情状，加上周边一些国家经济起飞势头的映衬，使中国农民实现温饱、脱贫致富的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了。

1980年，我恢复了名誉和正常生活，从1952年就被取消的社会学也得到了恢复，我有条件拾起被迫中断20多年的“为中国农民能富起来做些什么事”的实践课题，重新开始农村调查。我急切地想实地看看我曾经十分熟悉的江村经过这20多年风雨后的样子。1981年，我三访江村，高兴地看到了江村当时全年人均收入已接近300元，位于全国前列。而在1978年，江村的人均年收入还只有114元。为什么这个村子的农民能在短短3年中这么快地富裕起来？事实就在眼前：家庭副业恢复了，集体小工厂办起来了。当地农村经济结构中出现了农、副、工互相结合的现实和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让我特别兴奋的一点，是在江村看到了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经开始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而且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也显露了苗头。中国人口有十多亿，农村人口又占绝大多数，在这样的国情下，我认为多种多样的工业不宜集中在少数城市，而应当设法尽可能分散到广大农村里边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的意图，是使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比重时人口不致于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村的劳动者，而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我看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

江村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家乡吴江县的各个集镇都表现

出活跃的迹象，商品交换多了起来，城镇居民普遍增加。其中有名的吴江七大镇正在从先前冷冷清清的衰落景象里抬头挺胸，一股欣欣向荣的生机吸引着我。我看到了一种值得特别注意的变化，这就是由于乡镇工业办得好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绝对数字却在明显增长，增长速度也比工业不发达的乡村要快。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实，它向世界展示出中国发展经济道路上的一个崭新特点：中国社会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它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推动农业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把这个特点和西方早期工业化的历史作一个简单对照，中国乡镇工业的意义可以看得更清楚。在欧洲工业化初期，新兴的机器工业集中到了都市，农村却濒于破产，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西方工业化的发展是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工业化道路的一大特点。中国当然也要顺应历史潮流，但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绝不可能走西方的工业化道路。我们不能想象上亿乃至数亿的农民涌入城市来发展工业，中国的工业化只能走适合自己特点的路子。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利用来自土地的积累兴办乡镇工业。这种工业也以巩固、促进和辅助农业经济为前提，农副工齐头并进，协调发展。这条工业化道路已经切切实实地开始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不是从理论推论出来的成果，而是中国农民在改革实践中的新创造。

在这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变革中，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比较发达的地区，不论过去属于哪一类型的乡镇都先后开始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发生了以乡镇企业为基础的小城镇，而

且生机勃勃，引人注目，令我感动。在社会发展现实的推动和启发下，我开始了调查研究小城镇的课题。

二

1982年以后，我的社区研究领域比三四十年代已经扩大。首先是从农村扩大到小城镇，提高了一个层次，把小城镇看成是城乡结合部，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研究的地域也从家乡的一个村扩大到吴江七乡镇，又到整个吴江县，再扩大到苏南地区。到1984年，我走出苏南，进入苏北，对苏南苏北进行了比较研究。很明显，我这一时期研究地域的扩大有意无意地是顺着行政区域的层级进行的。有意思的是，对于特定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现象的观察和研究，使我看到了超越行政区域的一种经济区域发展的事实，这就是说我的经济区域的概念在观察现实经济生活中开始发芽苗长了。

这要从“模式”这个概念的发生说起。

在对苏南苏北的比较研究中，我看到苏北的乡村里工业化程度明显比苏南低，小城镇的兴起也比苏南慢。对于两地在发展上的差别，起初我以为是启步的先后不同。后来我意识到，地区间可以由于客观条件的不同而走上不同经济发展路子。在总结苏北调查的《小城镇·苏北初探》一文中，我把思想上酝酿的一个概念提了出来，这就是发展的“模式”。我具体提出了“苏南模式”这个名词。

模式这个概念是从发展方式上说的。因为各地所具备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条件不同，所以在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子，这是可以在实际中看到的。不同的发展路子就是我所提出的不同发展模式。“模式”这个新

概念，来自于我们身边正发生的客观历史事实。让这样的概念再回到正在成长的新事物中，用它来认识现实，也就能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点。

比如，在对苏南模式所作的研究里边，我把位于江北的南通划到了苏南经济区，让它和苏州、无锡、常州并称，道理就在于南通有和苏、锡、常大体相同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路子。苏、锡、常、通都位于长江下游，都是由于乡镇工业的兴起而进入工业化时期的。这几个地方乡镇工业的经历和发展机遇也类似。它们的前身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工业，即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办的工业。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是集体经济的实体，它有权在社员的劳动所得中积累一部分资金，用来兴办集体公有的工业，叫社队工业。到八十年代初江苏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苏南的农民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在改制过程中，乡和村的人民政府替代先前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管理这份集体经济，通过工业保存下了集体经济实体，又借助上海经济技术的辐射和扩散，以乡镇企业为名而继续发展。苏、锡、常、通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是大体相同的，我称之为苏南模式。我从经济发展的模式出发把地处长江北岸的南通划进“苏南”的范围，从概念上说，我已把心目中的经济区域摆脱了一般的以江为界的地理区域。

1986年，我到浙江温州考察。温州以它明显有别于苏南的发展方式进一步启发了我，使我对“发展模式”这个概念有了更深入一步的认识，明确了它的意义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发展路子。”这里所说的“地区”，既可以在某一行政区域范围内，也可能包括几个不同行

政区划的地域范围。但是在这时候，我还没有提出“经济发展区域”的概念。

客观发生的历史事实使我产生了“模式”这个概念。新概念的形成反映着客观实际的变化，是实践的产物，同时又成为认识工具，帮助进一步认识新生事物和促进实践变革。发展模式的概念把我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要求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的发展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这就促使我进入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各种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标发展的。共同基础是我们传统的小农经济，同一目标是脱贫致富，振兴民族经济。八十年代，各地农村先后进行了农业体制改革，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因此得到了支配自己劳动的自主权。他们除在承包的土地上经营农业之外，可以主动从事其他生产活动，以增加收入，这就大大调动了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他们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山万水地去开辟生财之道。

各地农民居住的地域不同，条件有别，所开辟的生财之道必定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我在观察和研究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时，没有忘记它们只是解决增加农民收入这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答案。对各种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也就是要说明它们有什么不同和为什么不同。具备了这种知识，各地农民都可以因地制宜地选择生财之道，争取早日脱贫致富。

如前所说的苏南发展的路子，是通过公社这个集体经济的积累，有足够资金一步到位地把工业引进了农村，借着农